

〔美〕 欧达伟 著

董晓萍 译

中国民众思想史论

——20世纪初期—1949年华北地区的民间文献及其思想观念研究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卷一

卷二

中國政治思想史

作者：錢穆 著 出版社：商務印書館 1980年12月第1版 1981年12月第1次印刷 320頁 定價：12.00元

中國政治思想史

中国民众思想史论

——20 世纪初期～1949 年华北地区
的民间文献及其思想观念研究

[美] 欧达伟 著
董晓萍 译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京〕新登字 184 号

责任编辑：寒 木

封面设计：治 武

责任校对：睿 父

North Chinese Folk Materials and Popular Mentality

by R. David Arkush

Central Nationalities University Press, 1995.

中国民众思想史论

(美)欧达伟 著

董晓萍 译

※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西郊白石桥路 27 号)

(邮政编码: 100081 电话: 8472817)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朝阳东方印刷厂印刷

850×1168毫米 32 开 4.25 印张 插图 4 页 90 千字

1995 年 8 月第 1 版 1995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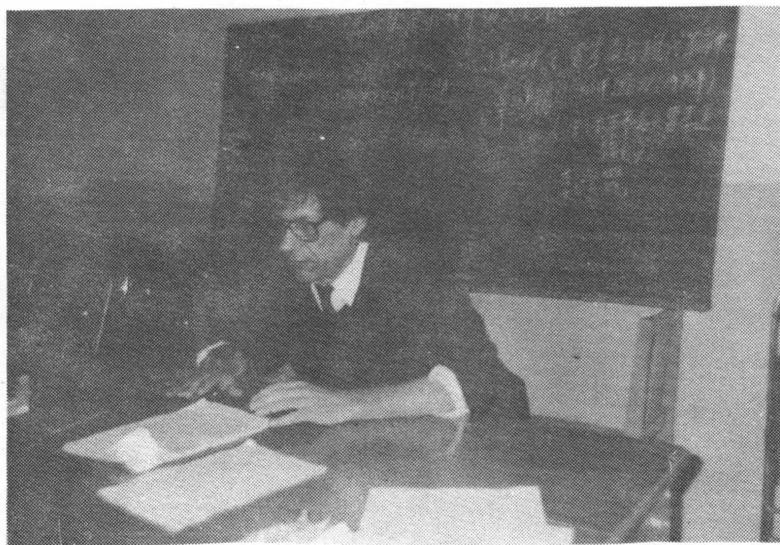
印数: 2000 册

ISBN7—81001—601—6/K·122

定价: 8.50 元



1992年9月,著名民俗学家和民间文艺学家、中国民俗学会理事长、北京师范大学90岁高龄的钟敬文教授与作者(左一)和夫人雷海伦(左二)女士合影。右一为著名文艺心理学家、北京大学金开诚教授。



1992年10月作者在北师大讲学,并与中文系民间文学教研室的师生进行学术交流。



1993年春节期间作者在河北农村调查时与定县秧歌演员合影(前排左五为定县秧歌著名老艺人宋文川先生,当地民谣流传:“拆了房,卖了砖,也要看看宋文川。”)



1993年4月作者第三次赴河北,向当地带领群众脱贫致富的农村干部和农民企业家作调查。

中 译 本 序

钟敬文

一个社会群体（部落、民族等）所创造和享有的文化，特别是那些优秀的文化，既是该社会群体的特有财富，又是全人类的共有财富。因为，在这个地球上，无论哪个群体，都是整个人类的构成部分。它所创造和享有的文化，特别是优秀的文化，当然要为人类所共有——包括对它进行疏理和探究的权利。而这种共有的情况，随着人类文明的进步，各社会群体间交往的频繁，它也必然更加扩大和深入。

* * *

中华民族是人类古代历史上少数开化较早的社会群体（民族）之一；在当前的时点上，它是既拥有极丰富的民族文化遗产、又正在创造同时代新文化的一个社会群体。

抛开史前的情形不说，仅从几千年来的经历看，中华民族文化也可以上溯到夏代。“五四”时期曾经一度被怀疑、乃至否定过的商代以前的历史、文化，近年来由于考古学上新资料的不断出现，那些古代文献上所记的史事，已经逐渐露出某些可辩识的影子。从周代以来，长长的三千多年，以炎、黄集团为中心的汉民族，在发展过程中，四方八面地、继续不断地接触、并融合了本土的和周围的部落（或民族），同

化了他们的人民和文化，终于壮大起来，成为一个屹立于东亚的民族国家。这种情形，一直持续到新中国建立前夜。现在，在我们这块大陆上，除了占主体地位的汉民族以外，同时存在着各自不同程度地保留着固有传统文化的五十多个兄弟民族。他们（包括汉民族在内的）结合成为一个庞大的、多元统一的中华民族。

我们汉民族，过去相当漫长的一段时期内，在政治、文化上曾经是一个东亚领先的民族（民族国家）。她的制度、文物，为周边民族所仰慕（所谓“天朝”），并给予他们以长远的影响。前世纪以来，中外外交人员及民间人士的来往更加频繁，因此，外国人士对我国历史、文化的记述、探索活动，在量和质上都有所增进。特别是法国、日本的中国学者，在历史学、文献学、社会学、乃至神话学等方面的成绩，是留心这一领域学术活动的人士所共知的。近年来，由于这样、那样的原因，在太平洋彼岸的金圆国家（美国）的学界，正兴起了“中国学”研究的新风。以费正清教授为首的哈佛中国新史学派，就是这门学术天空中的一个星座。

* * *

欧达伟（R. David Arkush）教授，是作风谨严而又富有创见的美国新史学派中的一位骁将。他60年代毕业于耶鲁大学，70年代进入哈佛大学的东亚研究院，以《费孝通和在革命的中国的社会学》的论文，获得博士学位。在学期间，受到费正清教授的指导和器重。近十多年来，他把精力集中于中国民众文化和思想的研究，发表了许多优秀的论文。他曾经住过台湾、香港和日本。从80年代后期起，又一再来到大陆（主要是在华北）进行田野考察。这些经历，已为他的中

国学研究提供了可靠的质量保证。他现在是美国衣阿华大学的历史学教授，兼任美国中西部地区亚太研究会的领导职务。

《中国民众思想史论》，是欧达伟教授近年撰写的关于中国现代下层社会思想史的论文结集，由董晓萍博士译成中文的。

本书在内容上，探讨了华北地区自大革命至1949年以前的一段时期，当地人民的精神世界。它分别从民众的恋爱婚姻观、道德观、对正统观念的态度，以及他们的创业思想等方面进行探索。他所采用的资料，主要是这些地区民间流传的土著文艺（秧歌戏及农谚）。透过这些民众自己创造和享用的文化产物，分析和揭示当地民众在这些文化活动中所涵蕴的观念、情绪和愿望。这在中国民众思想史（或者说精神史）的研究上，是一种新颖而又有效的方法；对我们民间文艺学、或民俗学的研究来看，也是一种可供参考的治学角度。

我近来反复读了欧达伟教授这本论文集所得到的感受，加上两年前听他演讲时所留下的印象，我实在禁不住有些话要说（这些话，我曾经断片地对同事和博士研究生们谈过）。现在，趁此书即将出版之机，我就把我想说的话，简略地写在下面吧。

* * *

（一）严谨的科学态度

欧达伟教授在论文中所表现的那种严谨态度，差不多从每一页、每一段落上都可以见到，因此，也自然要在读者的脑海里留下鲜明的印象。他对所用资料的来源、它的记录情形，以及可靠程度等方面，无不周密地注意到。对于他自己所作出的结论、或对别的学者的意见，在肯定或否定上，都

是那么讲究分寸，不夸大也不缩小。这种坚持严格科学态度的作法，在一般从事自然科学、或应用科学的学者笔下，是比较容易看到的。但是，在人文科学、社会科学的学者的笔下，就往往浮想臆断，不是那么严谨自律了。其实，人文科学等，因为它的对象性质的特点，这种科学态度，不但不应松弛，倒是应该更加严谨的。欧达伟教授所表现的严格态度，正是这方面学术作业的一种典范。它是值得我们认真体会和学习的。

（二）结论的优异性

大家知道，一种科学研究的最终目的，在于取得正确的（或者近于正确的）结论。但要真正达到这种目的，事实上并不容易。因为它的成功，除了本文上段所说的严谨的科学态度，还有种种必需具备的因素（例如丰富可靠的资料，作者的分析能力和刻苦精神等）。本书中的论文，都提供了富有创造性的结论。这是由于著者具有坚实的专业功底和锐利的观察、分析能力，并对所掌握的资料，做了实事求是的论断的结果。

从另一方面看，著者的这些结论，大都是些带有论辩性的见解。换一句话说，它们大都是对于那些已经存在或流行的有关意见、说法的否定或修正。如关于农民，特别是中国过去农民的性格、精神状态的新判断，就是其中的一个显例。在这里，结论虽然显得新颖，却不是著者标新立异，有意成为雄辩家；而是他根据实际材料，进行深入探索，自然得出的结论。这就使它们在思想史的研究和建设上，跨上了更高的层次，因此，也使这些零篇小幅，起到那些煌煌专著未必能企及的作用。

（三）著者的博学及其运用能力

一个科学者，不一定都是博学之士。但是，博学的确是一个非常需要和有益的条件。因为，它使学者在探究和论证上“左右逢源”，也使理论更能达到丰富和圆满之境。作为一个历史学家，欧达伟教授在这部论集里所表现出来的，无疑是一位书香四溢的博学者形象。他在论述华北农民某种文化、思想时，很少是孤立地进行的，虽然在主、次的地位上是那么分明。他的博学和善于运用，大概表现在两方面：一方面，是在提出某问题时，注意到前人或同时代人有关的意见，简要地加以援引，并加以扼要评论；另一方面，是在他论述对象特点时，能随时自然地提出别的民族有关的事例以相印证。这样做，就使得论述有花有叶，不是枯干一株。不管两者的哪方面，都丰富了理论的形象和加强了它的力度。博学，如果掌握不得当，也许会变成炫学。但是，欧达伟教授富有断制的能力，因而使他的运用恰到好处。或者说，他的博学在他的科学工作上运用的结果，完全是正面的。

（四）著者具有一种人文主义精神

科学工作的主要任务是探索和揭示对象的实际（或实质）。如果一个学者研究的结果是忠诚的，符合客观实际的，它就具有存在的价值。它不一定需要伦理精神等的附加。但人总是人。他（科学家）不能、也不应该漠视人群的幸福或痛苦。一个科学家（这里主要是人文科学家），在他严格的学术工作中，既能忠于客观的事实（真实），又隐含一种对人类说来是决不可缺少的伦理精神，那岂不更为可贵？大家知道，马克思的经济学著作是一种严格的科学理论，但它又潜藏着一种变革社会的意念。这就说明，一个社会学者或人文科

学者既是严肃的科学家，同时又是人文主义者。这是可能的，不，这是必要的。欧达伟教授在这部论集中所显示的，正是近于这种学者类型的。他对于中国华北广大农民妇女的观念、情绪，既科学地给以解剖，同时又对她们的命运隐含着同情和希望。因为这样，他的著作就具有更高品格。对于读者（至少是我们中国读者）也更加富有吸引力和感动力。

以上，是我对于欧达伟教授这部关于中国民众思想史著作所感到的几点意见。实际上，它的长处决不止此。但是，仅此已经尽够表明它在这方面学术史上的地位和价值了。

* * *

自然，在一般情况下，一部优秀的学术著作，跟它的长处同时存在，多少有它值得商榷之处（从读者的眼里看来）。因为事物的道理，大都是纷繁、复杂的，而个人的思考能力和知识蕴藏等，又到底比较有限。从这点看，欧达伟教授这部成功的著作，似乎也有些我们值得进一步考虑的地方。

首先，是作为民众思想史资料的采取范围问题。欧达伟教授的著作主要采用了定县的秧歌戏和华北各省的农谚，这是完全正确的。但是，作为华北民众精神史的研究资料，在当地口传文艺中，还有大量的传说、故事（狭义的），特别是笑话等。这些资料，对于民众思想、感情、愿望等的反映，有些是比较直接的，甚至于是更加泼辣的。例如，讽刺笑话，以及某些现实性较强的故事。有些作品，虽然比较富于幻想性，但是，它们也往往蕴含着强烈的思想因素，尽管在表现上是曲折的、或间接的。此外，还有许多社会性较强的民歌、小调（包括关于家庭矛盾、两性关系等题材的作品），也都对当地民众思想、感情等的探索，能够提供有益的资料。如果本

书著者在写作中运用了它们（关于它们的记录并不太难得），对于他的著作，也许成为一种“锦上添花”的景象。

其次，是对民众口传作品时限和空限的看法问题。一般民间流传的文艺作品，当然，有些是反映当时的社会现实和民众观念的，但是，更多的却是反映过去时代的事物和民众心理的。因为它们是历史的积淀物。它们有的起源很古老，随着世代的发展而沿袭下来。当代的某些谚语、故事、乃至民俗，有的可以溯源到两三千年前，或者更远些。自然，在这种流传过程中，它们受着社会现实和民众心理的影响，要产生或大或小的变化。但是，它们的主题、基本情节（故事），或主要语词却往往仍被保存下来，成为后代口传文艺的一部分。当然，也有些作品的产生时代是较迟的，但那不是口传作品的全部。总之，民间口头文艺，与专业作家的作品不同，至少其中有一部分（实际可能还是大部分）作品，是“长时限”的。现在流传的作品，不一定就是现在产生的作品。因此，它所反映的观念也不一定是属于当时的、或“短时限”的。

跟作品的时限问题一样，民间口头作品，还有空限（即流传地域）问题。在某一地区流传的作品，不一定就是当地产生的。它可能是从邻近地区传来的，乃至为广泛地区所共有。中国现在民间流传的故事、谚语等，有的流传地竟是遍及南北的（自然在形态上要有或大或小的变化）。因此，这些作品中所反映的民众观念，就不能限于当地的，更不能只代表（或充分代表）当地的。

作为民众心理的反映，在取材上限定时间和地点，这自然是合理的。但是，由于上述的情况，研究者对于资料的选择、处理，就必须格外当心。要充分看到口头文艺在流传中

的上述情形，并突破时、空界限地去搜集和考察有关的作品及其背景。这样做，就能使视野不为那些界限所束缚，因而取得更加圆满的效果，至少也可以除去某些可能产生的局限。

以上这些问题，欧达伟教授并不是完全不知道，在他有些论述中，也曾偶而涉及它。但是，由于时间、或资料等的限制吧，他似乎还缺少给以更多的重视。科学工程是一种持续的工程。欧达伟教授正当壮年，他对于中国学的研究又是那么雄心勃勃，随着时间和工程的进展，我们现在认为值得考虑的问题，他一定会称心地给予解决吧。

* * *

欧达伟教授是在前年六月离开北京回国的。我们阔别以来已经两年了。在这段时期里，他所建议的“中国民间文化研究所”已经成立，他所关心的这方面专业书库也基本建成。而他自己的中国学研究，在跟董晓萍博士的合作上，又捷报频传——写出了两部富有新意的专著。这些，决不止是我们少数朋友间的喜悦！它是国际中国学研究园地里胜利的一种新喜讯！是中美两国民间文化交流、合作的一块新路碑！

上面为欧达伟教授即将在中国出版的论集拉拉杂杂地写了些意见，一方面，为了酬答他见嘱的好意；另一方面，也当作对友人的一回面谈，并藉以讨教。

末了，我诚心希望这本论集，能够成为中国关心这方面问题的青壮年学者的良朋益友！

1995年6月18日于北京
时年九十二岁

中译本自序

此书即将在中国出版，我深感荣幸。然而，高兴的同时，也令我不安。我不敢说，它能够当此殊荣。许多中国读者了解书中所讨论的史实，远胜于我。而且，毫无疑问，他们将多少发现与自己亲历的事件和自身阐释互有出入之处。何况，一个局外人因兴趣的不同，有时还可能采取不同的研究角度。

在此，我或许可以就个人不同的研究角度，略加说明。最让人奇怪的事情，恐怕莫过于我的历史学本行出身。中国读者未免会问：一个历史学家，却在研究民俗学，这怎么可能呢？

谈谈我的学术思想经历，也许有助于回答这个问题。我读大学时所学的专业是哲学，后转向一种相关的历史学领域，即思想史。从那时到现在，我的研究大都是属于这一范畴的。我的博士论文研究中国的社会学家费孝通，经扩充出版了英文原著。中译本由时事出版社1985年出版，易名《费孝通传》。但我应该强调，此书并非传统意义上的人物传记，而是分析和探究中国20世纪思想史上的不同时期、地点所产生的各种社会事件中的费孝通思想。我在思想史方面的其它著述，比较主要的，有讨论清末民初的保守派代表人物辜鸿铭的，他受过西方教育（包括懂拉丁文），却成为中国一切传统文化的卫道士，他反对现代化，甚至提倡妇女缠足，是一个古怪的人。有探讨1956—1957年“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时期的思

想现象的，我为此撰写过王蒙小说《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的书评，王文一度引起争论，我讨论了它的政治含义。近年来与李欧梵合作，我们还出版了另一部探索中国人眼里的美国的著作，该书选取了19世纪中期至20世纪80年代的较大的历史跨度，展示了中国人看待一个西方国家的观念的变化，书名《无鬼的世界》。

但是，我不满足于这种思想史的研究。我感到，这样拘泥于上层阶级的思想材料，视野过于狭窄。我产生这种念头，起因于美国60年代反对越战的运动给我的思想影响。我的同时代人大概都与我有相同的感受。在我们看来（我至今还认为），这场战争，是一种帝国主义的行径，它使一个贫穷小国的大量人民无日不在蒙受残忍的杀戮和戕害。美国当局将对方一手推入毁灭和痛苦的深渊，这比任何可能发生的正义之师的接兵交战，后果都要糟糕一千倍。我们还认为，战争之穷凶极恶，同时在于它激起本国人民的愤慨。在那些夙夜难寐的日子里，我们和战争的受难者一道承受着精神的煎熬。出路只有反对政府。我们认为，除非改变当时的美国社会和文化，否则，无法引咎自责，乃至担负起抵御一切邪恶事物的人类道义。那么，身为知识分子，从事某种学术事业，越是较少地依赖精英去改变上层社会，就越能设身处地地理解民众的生活和情感，这两者之间的道理应该是一致的。当时萌发了新的想法，我在撰写关于费孝通的博士论文时，在一定的程度上，自然而然地，调转了研究方向。而费氏的著作主要涉及中国的乡村社会和农民问题，这是中国读者所熟知的。

就广义的学术背景而言，我的著述受到了欧美近几十年来历史学总体思潮的影响。这股思潮，或称“新史学”，或称

“年鉴学派”（以法国最重要的历史学杂志《年鉴》命名），其突出贡献在于拓宽了历史学的疆域。旧史学孤立地强调上层阶级的意识形态、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即我们现在所说的政治史。新一代历史学家则不然。他们还注意其它的科学门类——地理学、经济学、人口统计学、社会学、人类学、语言学 and 心理学等，从中获得启迪和灵感。在研究范畴方面，他们不再恪守陈旧的话题，例如，统治者、政府和战争，而是囊括了人类生活的全体事象，包括气候时令；科学技术；人口变迁；城市；妇女、家庭、儿童和性欲；日常生活和物质文化；等等。他们研究思想观念，也不止于圣哲的言论，而把目光转向了更加广泛的、社会各阶层人们的共享信仰、思维习惯和文化结构。这些新的研究领域，被称作“精神世界”、“历史心理学”、“群体表象学”、“下层文化”等，都是这一派学说的重要内容，在法国尤其如此。

我的目的是了解中国民众的精神生活。开展这项工作的问題，在于寻找资料的来源。中国的民间文化，特别是传统的民俗资料，其创作者和享用者主要是不识字的农民。因此，我选择了他们的口承民间文学，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一部分原因，也由于它们的藏量丰富和一直被历史学家们所忽略。当然，对于历史学家来说，使用民俗资料不是不存在异议的。至少可以说，经文字保存的口头文献，已经发生了变化，就值得讨论。比如，那些方言土语难以被原原本本地记录下来，便被转述成白话；那些猥亵的言词总要被删除，才能通过审查；那些迷信的内容一般都被现代编辑砍掉，以避免不良影响；以及那些贱视、或侮辱妇女的字眼，被调换更新；等等。历史学家研究民俗资料，需要将这些附带的改编因素考虑进